

自 1992 年参议院对体育教育进行调查以来， 发生了哪些变化？ 对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局 (BCE) 三所小学的学校应对措施进行评估

蒂莫西·林奇- 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昆士兰州,澳大利亚

1992年,参议院对澳大利亚教育体系中的体育教育和运动状况进行了调查。

这被认为是体育教育史上最重要的审查 (Kirk,1998)。该调查指出了资源、时间分配和教学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自参议院调查以来,昆士兰州制定并实施了详细的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课程文件,取代了过时的1972年版体育教学大纲。本研究发现,在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局的三所小学中,为应对参议院调查中发现的问题而采取的策略提高了HPE课程大纲中体育活动部分的实施效果。此外,当课程大纲成功实施后,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兴趣也显著提高。

引言在20世纪80年代末

和90年代初,澳大利亚学校的体育课程被认为处于危机之中 (Tinning,Kirk,Evans和 Glover,1994),昆士兰州学校的体育教育也明显存在危机 (Walmsley,1998)。体育教育会议和期刊上关于危机的“内部”讨论促成了参议院对体育教育的调查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的报告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证实了这些关于危机的“内部”讨论。

根据提交给调查的证据,体育课时减少的原因包括:· 由于课程安排拥挤,体育等科目受到挤压;· 将体育纳入健康教育;· 缺乏连贯的体育政策和……

就体育课的既定目标达成一致;· 将决策权下放给学校理事会;· 减少体育课时数

专家;
· 教育部门对体育教师的监督工作缺乏支持,以及 · 体育与澳式体育等其他体育项目之间的混淆 (Swabey,Carlson
和 Kirk,1998 年,第 4 页)。

参议院常设委员会的报告

澳大利亚联邦环境、娱乐和艺术部 (1992 年)建议,应优先制定详细的体育课程政策。

参议院的调查恰逢八项关键学习领域国家声明和概况的制定,最终将体育课程纳入健康与体育教育这一广泛的学习领域。这份政策文件取代了1972年制定的过时的小学体育教学大纲。

昆士兰州学校课程委员会 (QSCC)成立于1997年,负责监督1至10年级八个关键学习领域的课程教材开发 (Dinan-Thompson,1998)。1999年昆士兰州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 (HPE)课程大纲首次由昆士兰州的三大教育系统 昆士兰州教育局 (EQ)、昆士兰州天主教教育委员会 (QCEC)和昆士兰州独立学校协会 (AISQ) 合作制定。目前,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局 (BCE,2006a)聘用了13名宗教教育课程官员/审核员,在学校课程更新期间为各学校提供支持,但尚未设立负责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 (HPE)关键学习领域的课程官员。

澳大利亚体育教育危机被认为具有文化意义 (Tinning & Fitzclarence,1992)。健康、体育与健康教育 (HPE)课程大纲采用了一种社会文化学习方法,该方法承认学生会受到不同的生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Dann,1999)。这种社会文化方法是……

以社会正义原则为基础,包括多样性、公平和支持性环境 (QSCC,1999)。

昆士兰州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课程大纲中的体育部分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发展体育活动的概念和技能。其他方面包括:促进个人和社区健康;以及增强个人发展。体育教师需要掌握社会文化方法,了解各种能够在体育课中实现这一目标的教学法,并能够根据具体的体育学习体验选择最合适的教学方法 (Tinning,1999)。这通常意味着教师应优先选择批判性的、社会公正的教学法,而不是传统的、以科学为导向的、注重表现的教学法。教师需要接受社会批判教学法的教育和培训 (Tinning,2004),这将有助于提升教师的自信心和体育课程的实施效果 (Morgan & Bourke,2005)。

课程大纲的设计十分周全,确保每个教育体系下的学生都有充分的机会在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 (HPE)方面取得成功。具体实施工作由三个教育体系各自负责,因此各体系的做法有所不同 (Dinan-Thompson,1998),这使得对文本的重新解读和语境化方式也各不相同 (Codd,1988;Glover,2001)。政策的最终成败取决于其执行情况 (Schneider,1982)。

1999年,昆士兰州教育委员会 (BCE)实施了首个以成果为导向的体育与健康教育 (HPE)课程大纲 (BCE,1999)。学校可获得初始在职培训资料包、昆士兰州学校课程委员会 (QSCC)提供的参考书以及一般专业发展培训 (BCE,1999)。该课程的实施阶段已于2001年底结束。自实施支持终止以来,BCE下属学校既没有设立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专员 (BCE,2006b;BCE,个人交流,2003),也没有开展任何体育与健康教育专业发展培训。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学校不太可能获得体育与健康教育方面的直接支持 (BCE,1999;BCE,个人交流,2003)。

昆士兰州学校学生的久坐行为日益令人担忧。昆士兰州政府于2003年10月启动了“昆士兰儿童和青少年活力计划”(Get Active Queensland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Strategy) (Mackenroth,2004),旨在帮助解决日益严重的儿童肥胖问题 (Mackenroth,2004,第1页)。2004年6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启动了另一项名为“建设健康活力澳大利亚”(Building a Healthy, Active Australia)的计划,其目标与昆士兰州政府类似,旨在解决儿童活动量下降的问题。政府在2005年至2008年的四年期间为该计划拨款1.16亿澳元 (Howard,2004)。澳大利亚约五分之一的学生就读于天主教学校 (澳大利亚教育联盟,2003;MCEETYA,1995),因此天主教学校对很大一部分澳大利亚学生有着影响。

研究目的本研究的目的是确定1992年参议院体育教育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在1999年实施HPE课程文件后,是否仍然是布里斯班三所天主教教育小学关注的问题。

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探讨三所不同教学水平的卑诗省小学体育课的教学实践。

入学人数。在建构主义范式下,开展了一项解释主义研究,更具体地说,该解释主义研究采用了符号互动论。

本研究采用“评估性”和“多案例研究”方法 (Merriam,1998)来构建意义,并捕捉每所学校的具体情况。三个案例研究的地点分别为:一所小型BCE小学 (学生人数少于200人);一所中型BCE小学 (学生人数200-400人);以及一所大型BCE小学 (学生人数超过400人)。选择这三个案例研究是为了使其在人口统计特征方面具有代表性,这些特征体现在学校规模 (以入学人数衡量)、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

为了在选定的理论框架内精确把握细节,本研究采用了多种方法,包括半结构化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反思日志、观察和文献分析。参与者为各学校的教师和学生。

数据分析:本研究采用解释主义数据分析策略,以叙事/描述性分析来阐明每个故事/案例研究。

每个案例均采用惠灵顿 (Wellington,2000)简化的“定性数据分析恒定比较法”(图1)进行分析,并加以描述。每个案例分析结束后,均呈现了跨案例分析结果。重复相同的分析流程,运用惠灵顿的各阶段方法 (图1)分析所有案例研究的数据。所有数据结果,包括单个案例研究学校的数据和跨案例分析的结果,均以叙述性/描述性报告的形式呈现 (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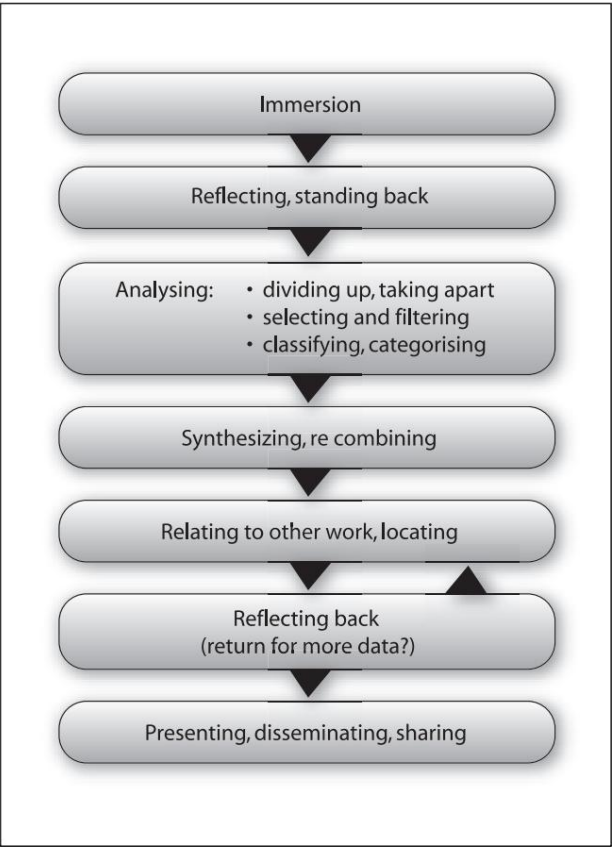


图 1:理解定性数据的一般阶段 (Wellington,2000 年,第 141 页)。

第一阶段 :使用以下工具对每个案例研究/学校的数据进行分析 惠灵顿的分析表。
第二阶段 :对每个案例研究进行叙述/描述性分析的报告。
第三阶段 :再次运用惠灵顿的分析表进行跨案例分析。这次分析的是整个故事或故事片段。
第四阶段 :叙述/描述性报告 ,用于跨案例分析。

表1 :数据分析过程。

意义单元被形成、编码,并与其他相似单元进行分类。表2展示了一份编码后的半结构式访谈记录副本。

分析过程形成了审计跟踪,图 2 以图表形式表示了学生的看法。

分析过程 :孩子们对体育课的看法是什么?

第一阶段 :数据生成、显示和反思。	
参与者	数据生成策略
学生	问卷 焦点小组访谈 课程观察 反思日志
体育教育专科教师/ 体育教育主管教师 课堂教师	半结构式访谈 课程观察
第二阶段 :数据编码和提炼。	
从收集的数据中提炼出的主题。	
- 午餐时间活动 课外活动 体育课乐趣 学校涵盖的体育项目 - HPE练习册 - 特殊设备 - 市盈率 学生兴趣 - 体育课上最喜欢的活动和能力游戏	- 最喜欢的学习领域 体育课上会发生什么? 包容性问题 - 参与 - 促进健康生活方式 - 技能和移动能力
第三阶段 :关键主题的生成	
第二阶段数据主题分类。	
学生对体育课的喜爱程度 - 学生参与体育课的积极性 - 市盈率的价值 促进健康生活方式 - 技能、动作能力和胜任力	
第四阶段 :故事报告和结论	
学生的参与度和兴趣与“发展体育活动概念和技能”这一教学环节的 实施质量之间似乎存在直接关联。当学生有机会发展基本的移动、 非移动和操作技能时,他们通常会更加自信,也更享受体育活动。学 生们表示,体育活动有助于释放压力、增强动力、提升自尊心、团队合 作能力和注意力。	

图 2 :儿童感知数据分析描述
体育教育。

访谈记录	编码
" 你觉得健康与体育课程的哪些方面最吸引你?"	
P 因为我对它了解不多,所以很难说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就我所看到的而言,我喜欢它的编排方式,因为它很容易理解,容易阅读,我就是喜欢它的编排和结构。	· 教师对教 学大纲的熟悉程度 · 教师 的自信心和 知识水平 · 对 教学大纲的 喜好和厌恶

表 2 :访谈记录编码。

研究结果介绍案例研究概要 一
所学校 (学生人数少于200人)

案例研究一 :参与研究的学校教师均为经验丰富的教师,每位教师至少有十年教龄。所有参与研究的教师均未接受过体育方面的专业培训,只有一位教师接受过1999年昆士兰州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课程大纲方面的专业发展培训。

在幼儿班,凯特 (化名)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有限。当被问及她对1999年版体育与健康教育 (HPE)课程大纲的掌握情况时,她说她“并没有完全按照大纲来教”。在中学班,乔迪 (化名)证实她的教室里没有体育与健康教育教材,而且她“以前从未见过”。高年级班主任兼体育协调员凯文 (化名)接受了关于新版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大纲的专业培训。凯文认为,经过补充和/或修改后,这些辅助材料和模块“对教学非常有帮助”。

学校没有专门的体育教师,所有三个教学大纲的内容都由班主任负责实施。凯文证实,学校没有任何针对体育教学大纲的全校性项目 (表3)。

在案例研究一的学校中,体育活动部分得到了最多的重视和时间投入。低年级学生表示,他们每周五的体育课上都会进行“跳绳和球类游戏”。在体育课观察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被问及感知运动训练计划 (PMP)时,凯特表示:“没有固定的训练计划,老师们会在课堂上自行安排,例如,脑力训练。”低年级学生没有提到他们学习过任何感知运动技能。

乔迪提到,中学阶段“学生们会参加游泳、校际运动会、田径和跳绳”。高年级学生表示,学校的体育活动包括“游泳;田径:铁饼、铅球、跳远和接力;触身式橄榄球、球类运动、舞蹈,以及每两年一次的澳式橄榄球”。在体育课观察期间,高年级学生学习了无挡板篮球的技巧和一种改良版的无挡板篮球比赛规则。

凯文表示,为了推广体育活动课程,他们开展了“全校 (包括学前班)的课程,重点是田径、控球和球类运动技巧”。

采用互惠式教学方法,由高年级学生教授低年级儿童。然而,乔迪

	案例研究一	案例研究二	案例研究三
HPE专家	否		
HPE专家在职培训课程	不		不
参与专业培训的课堂教师人数为12人。			
根据新课程大纲制定			
清楚了解各个环节的负责人	否		
不涉及额外费用（无需向其他组织支付费用）	额外费用		额外费用
执行教学大纲）			
参与课堂教学的教师人数（已证明）	1 20		
书中的 HPE			
全校计划	不		不

表 3:跨案例数据分析结果总结。

	案例研究一	案例研究二	案例研究三
设施和空间	好的	贫穷的	非常好
体育器材	充足的	好的	非常好
教学资源（书籍、教具包、视频）	贫穷的	好的	非常好

表 4:案例研究学校资源和设施比较。

	案例研究一	案例研究二	案例研究三
教师对学生体育兴趣水平的看法	中等的	高的	高的
每个焦点小组访谈的学生人数为68人。			
早期教育学生参与者中最喜欢的人数为0 (0%)	0 (0%)	6 (75%)	
受试者为PE			
参加中学阶段学习的学生中,最喜欢体育课的学生人数。	2 (33%)	3 (37.5%)	0 (0%)
高年级学生中,最喜欢体育科目的人数	0 (0%)	4 (50%)	0 (0%)
体育教师	不	是的	是的

表 5:案例研究学校学生参与者对体育的兴趣比较。

质疑高年级学生是否在教授他们的课程
低年級的伙伴學生對嗎？
凱特指派體育協調員凱文擔任此職。
體育老師“負責保管體育器材”。
凱特補充說：“我們努力添置設備，但……”
所有東西似乎都會消失。觀察者
研究人員發現，體育活動器材是
足夠了。研究人員在為期三個月的實地考察和觀察中注意到，
設施
教學資源顯示出疏於管理的跡象（表 4）。
僅限於三個 HPE 文件夾，其中包含活動
出自“日常體育教育”計劃（ACHPER，
1982）。
教師們表示，學生們對……的興趣一般。
體育活動，這一點通過觀察和焦點小組訪談得到了證實（表
5）。然而，
參與的教師並不認為學校是
由於沒有專業的體育老師，這讓她處於不利地位。喬迪
他還補充道：“我確實很感激游泳教練們。”
最後，他總結道：“我更喜歡用其他方式來釋放壓力。”
所有來自小學、中學和高中階段的学生參與者
多年來人們一直認為體育課很重要。

參與者認為健康生活方式得到了推廣。
通過諸如生命之光等組織對學校的訪問。
教育車、為心臟跳繩、舞蹈狂熱
通過他們的防曬安全規則“不戴帽子，不准玩耍”。
案例研究二總結
（200-400名學生）
案例研究二：這所學校似乎擁有一個設計完善的……
並實施了體育課程計劃。
學校有一位經驗豐富的體育專科教師。
為每班學生提供至少一節四十分鐘的課程
每周。所有參與者都同意 HPE 專家
負責體育活動方面的工作
課程和課堂教師負責……
健康與個人發展方向。
參與的教師均接受過專業培訓。
在 1999 年 HPE 課程綱中，發展程度各不相同。
早年間，金（化名）
多年來，肖恩（化名）參加了在職培訓。在上
多年來，露西與 HPE 課程的接觸僅限於
她在大學里“學習了健康科學”。
HPE 專家非常熟悉課程綱。

1999-2001 年,他是 BCE 健康与体育教育支持网络的成员,协助 BCE 系统实施新的教学大纲,并且拥有教育学硕士学位 (体育与健康教育) (表 3)。

体育活动种类繁多,范围广泛,充分利用了学校的设施和有限的空间。低年级学生焦点小组的成员提到,体育课包括学习跑步、接力跑和田径运动、游泳、平衡木练习、学习投掷 (包括下手投掷和上手投掷)和接球、足球技巧、篮球、舞蹈、跳绳和玩 “稻草人跳绳”游戏。中高年级学生焦点小组的成员也证实,他们的体育课同样内容丰富。一位高年级学生表示,课程通常以趣味游戏开始: “通常是在开始时作为热身”,而改良后的游戏则作为总结活动: “我们在学习完技能后,会在最后玩这些游戏”。对专家在学年初设计的全校体育教育计划的文件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高年级学生表示,他们喜欢团队运动,“大家一起合作,团队精神很好”。

肖恩表示,学校里 “空间非常宝贵”。体育教育专家利用了距离学校400米的橄榄球场。据金说,这片场地让学生们可以 “尽情奔跑,舒展筋骨”。

研究人员和教师参与者都认为设备和资源充足。肖恩说: “我们体育馆里的设施在大多数小学里都很常见。”

为了鼓励学生在课间进行体育活动,学校给每个班级分发了旧器材,还提供了一个大型运动器材箱来存放这些器材。图书馆里也备有体育课教师资源。露西说: “我们有 ‘跳绳健身套装’之类的东西。”

教师们表示,学生们对体育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一点也通过观察和焦点小组访谈得到了证实 (表5) 。金老师说,在低年级, “我的学生们非常喜欢体育课”。肖恩老师指出,到了中年级,学生的态度 “非常积极,非常感兴趣”。高年级老师露西解释说: “我的学生们总是对体育课充满热情,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上课。即使是不爱运动的孩子也喜欢上课,因为我相信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威胁。”

学校通过 “不戴帽子不准玩耍”的防晒安全规定、步行上学计划、校际体育活动以及澳式足球启蒙和午间触式足球和蓝网球比赛,进一步推广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案例研究概要 :第三所学校 (400多名学生)
案例研究三 :学校配备了一名全职的体育教育专科教师。学校拥有充足的空间、许多设施、足够的设备和现代化资源 (表4)。

四位教师参与者的教学经验和健康、体育与体育教育 (HPE)课程大纲的专业发展程度各不相同。自2001年开始任教的教师参与者对课程大纲不太熟悉。他们没有接受过该学习领域的在职培训,并且表示或表现出他们缺乏相关知识。

实施过程中缺乏信心。在早期,艾丽西亚 (化名)当时教龄三年,学校没有提供任何在职培训,大学也没有学习过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 (HPE)课程。她解释说,她接触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的机会 “其实很少,因为我大学读幼儿教育专业的时候,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这门课就被取消了”。

当被问及她喜欢课程大纲的哪些方面时,艾丽西亚回答说: “我其实不太了解。”这位专职体育教师教健康与体育课,当时是她教龄的第二年。

她声称拥有加拿大体育教育荣誉学士学位,但并未在体育教学实践或专业知识方面得到体现。她最初接触1999年版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 (HPE)课程大纲是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 (澳大利亚)的HPE单元。“我之前没有接触过其他任何课程大纲,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使用这个大纲。”她不喜欢这个大纲 “内容重叠,随着孩子们学习的深入,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她说: “你需要确保课程难度稳步提升。”

此外,面试官还询问了体育教育专家学校是否有全校范围的体育教育项目,并解释了 “全校范围项目”的含义。专家的回答虽然间接是 “否”,但他谈到了全校范围项目的益处。学校既没有制定教师遵循的政策或计划,也没有提供任何说明让教师了解教学内容。

在课堂观察中,体育教师采用的一种教学策略是,在 “老鼠和兔子”游戏中,如果学生数到三后返回场地过慢,就罚他们绕着场地跑一圈。在所有年级的课堂观察中,包括幼儿班、初中班和高中班,都使用了体育活动作为惩罚手段。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低年级、初中班和高中班的学生都在练习足球技巧,然后进行一场改良版的足球比赛。当被问及体育课的内容时,一位幼儿班的学生解释了研究人员观察到的足球活动: “我们有一个队伍,我们要踢足球。我们有红、蓝、绿、金四种颜色,每个人都加入队伍,谁进球谁就暂停,然后另外两个队伍上场继续比赛。”

体育教师负责教授学校从学前班到七年级的所有课程。学前班至五年级每周有一小时的体育课,六年级和七年级每周只有半小时。这样的安排是为了方便教师安排课余时间。

中学阶段的Bianca (化名)和高年级阶段的Veronica (化名)证实,1999年学校教职工在学生放假期间会参加两到三次时长一到两小时的体育健康教育 (HPE)课程大纲培训。两位参与培训的教师认为体育健康教育专员负责教授所有三个方面的课程,而该专员则认为她只负责体育活动方面的课程。Alicia说: “她会制定教学计划,我们不太了解具体情况,但我们都默认她会按计划完成所有工作,并在年底给我们汇报结果。”

比安卡补充说,这三个方面 “基本上都由体育老师负责”,健康与个人发展只是课堂上顺带涉及的内容, “并非刻意安排”。这位体育老师表示,她只负责体育活动这方面。

来自早期教育焦点小组的学生参与者

报告称,体育课包括“跑步、慢跑、赛跑、在操场上玩耍、跳绳、踢足球和投掷网球”。体育课专职教师声称,低年级的孩子会和高年级的学生结对进行感知运动训练,但没有老师或学生能够证实这一点。一个男孩解释了他们通常的训练内容:“我们在操场上玩耍,然后老师吹哨,我们就排成一队,男生队和女生队,去喝水。”

艾丽西亚也表达了支持,她说体育老师会“带他们(低年级学生)去堡垒(冒险游乐场)玩,这能锻炼他们的体能”。此外,中学组的学生参与者提到,体育课规则包括“不要反方向攀爬单杠”和“不要爬滑梯”。

来自高年级学生焦点小组的参与者解释说,体育课包括“足球和跑步、田径:跳高、跳远和铅球、篮球和躲避球”。他们还有游泳课、越野跑和田径运动会,以及第二学期的校际体育比赛。

所有参与的教师都认为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学习区非常有价值,学生们似乎也很喜欢HPE的体育活动。然而,学生们对核心学习区的兴趣似乎不如教师们认为的那样浓厚(表5)。

学生们认为体育课有助于减轻压力。参与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课程的教师和学生认为,学校通过“舞蹈狂热”(Dance Fever)和“跳绳为心脏”(Jump Rope For Heart)等组织的来访以及“不戴帽子,不准玩耍”的校规,促进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的教师指出,HPE课程大纲中的所有三个方面都需要改进。

跨案例分析总结:虽然可以得出一些相似之处,但三个案例研究学校的数据结果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

新课程大纲所倡导的包容性、社会公正的体育课程的转变程度与以下因素有关:学生的兴趣;教师参与者在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学习领域的经验、知识和信心;案例研究学校的设施、设备和空间;案例研究学校在社区内建立的合作关系和服务;案例研究学校是否有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专科教师;以及学校是否实施了全校性的体育关键学习领域计划(表3和表4)。

讨论:截至2001年

HPE课程文件实施阶段结束,案例研究学校中似乎没有一所按照天主教雇主BCE设想的HPE关键学习领域制定学校课程计划。在本次研究数据收集过程中,仅有一所案例研究学校(案例研究二学校)制定了包含体育活动部分的HPE课程。

在三个案例研究学校的样本中,实施程度与体育教师的资质、知识和经验水平,以及其对1999年教学大纲文件的理解程度,以及其与同事分享这些知识的能力相对应。当上述任何一方面有所欠缺时,例如案例研究三中的学校,教师

与会者未能就课程大纲三个部分中每个部分的教学责任人达成共识。

研究还表明,经验丰富的教师比经验较少的教师更有信心,对HPE课程大纲也有更深入的了解,因为他们在1999年HPE课程大纲发布时就接受了相关培训。只有了解各种教学法,并意识到何时选择最合适教学法,才能实现高质量的体育教学,因此,教师需要接受教育和培训,才能运用社会批判教学法(Tinning,2004)。

教师可以被聘为体育教师,但未必具备专业资格,因此高质量的课程无法始终得到有效实施,从而对学生对体育活动的看法产生负面影响(表5)。那些不太熟悉教学大纲的教师,表现出或表明他们缺乏实施教学大纲的信心。这种信心和知识的缺乏似乎与体育教师的培训和资格不足有关(Morgan & Bourke,2005)。

在三个案例研究学校中,有两所学校聘用了体育教育专科教师,但其中只有一人接受过1999年版体育教育课程的在职培训。矛盾的是,数据显示,这位体育教育知识有限的教师却是本研究唯一一位全职教师。

来自三个BCE案例研究学校的数据表明,一些学校依赖体育组织零星的到访来实施教学大纲,这通常会给学生带来额外的费用。案例研究中没有专职体育教师的学校普遍缺乏体育资源和支持。案例研究二中的学校通过与社区建立合作关系和服务,克服了场地不足的问题。

自2001年底以来,卑诗省教育委员会(BCE)不再聘用健康、体育和体育(HPE)教育官员,也未在该关键学习领域开展任何专业发展活动,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新加入卑诗省教育委员会学校系统的教师缺乏对1999年版HPE文件的知识和熟悉程度。案例研究二中的学校似乎是课程实施方面最成功的学校,这主要归功于其经验丰富的HPE专家。虽然这表明一所学校内部发生了变化,但如果没有卑诗省教育委员会的支持,系统性的变革将无法实现(Fullan,2001),案例研究一和案例研究三中的学校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

结论:正如澳大利亚参

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的报告(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所揭示的那样,这三所案例研究学校似乎都容易受到导致体育课衰落的诸多因素的影响(Swabey等人,1998)。综上所述,本文利用数据结果,对这三所案例研究学校的“衰落原因”进行了分析。

· 由于课程安排紧凑,体育课时受到挤压。

由于课程安排拥挤,体育教育面临压力,而且在没有体育教育专科教师的学校里,体育教育的三个方面似乎都受到了影响。

· 将体育教育融入健康教育

在三个案例研究学校中,似乎只有体育活动这一体育教学模块得到了持续且有针对性的充足教学时间分配。学校内部的沟通是确保这三个模块得到公平对待的必要条件。

- 没有连贯的体育教育政策,也没有就体育教育目标达成一致意见。

这项研究表明,在三个案例研究学校中,只有案例二学校实施了以全校课程计划为指导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 (HPE)课程。此外,该课程计划仅涵盖三个组成部分之一 体育活动。该全校课程计划是在过去两年内制定的,由新聘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专科教师设计。因此,在2001年卑诗省教育厅 (BCE)完成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课程大纲实施时,三个案例研究学校似乎都没有按照卑诗省教育厅设想的,以学校课程计划为基础开展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这一关键学习领域的教学。这表明,计划的实施期 (1999-2001年)并不充分。

- 将决策权下放给学校理事会。

BCE 已强制要求学校实施和更新课程。由于实施过程涉及深入学校,因此学校校长和学校管理人员对此负有重大责任,他们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Medland & Taggart,1993) 。

学校行政部门的直接职责是支持课程的制定、实施和监督 (BCE,2006c) 。此外,校长决定是否聘用体育与健康教育 (HPE)专科教师,以及他们需要哪些资格和经验,并最终决定由谁来担任该职位。

- 减少体育课时
专家。

并非所有卑诗省学校都配备了体育教育 (HPE)专职教师,例如本研究中的案例一学校。案例一学校的学生因此技能和动作发展水平较低。此外,一些有幸聘请体育教育专职教师的学校,其教师有时既不具备资质也不具备提供高质量教学体验的能力,例如案例三学校。数据表明,教学质量的不足会导致学生缺乏学习兴趣。

- 教育部门、教师教育和雇主对体育教师的指导工作缺乏支持。

教育部门对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的支持似乎在专业经验层面和教师教育层面都存在不足。显然,过去四年进入教师队伍的许多新毕业生对HPE课程大纲并不熟悉。一些毕业生完成了四年的大学教育学位,却从未学习过任何HPE单元,随后就被委以重任,负责教授这一关键学习领域。

支持和压力似乎确实缺失,因为宗教教育课程官员/协调员的比例并不理想。

与 BCE 中的 HPE (13:0) 相比,意味着 (BCE, 2006a)。

- 将体育教育与其他体育项目 (如澳式体育)混淆。

学校必须谨慎地将体育组织作为课程的延伸,而不是替代课程 (Emmel, 2004) ,正如之前的澳大利亚体育教育项目 (Moore,1994;Tinning,1994)所发生的那样。案例研究一和案例三中的学校需要制定一套体育课程方案,以备将来取代这些体育组织,因为总有一天这些组织会不复存在。聘用合格且充满热情的体育教师将为学校的健康促进和体育活动项目节省额外的开支。

这项研究产生的数据表明,如果从战略角度考虑1992年参议院调查中提出的体育教育和运动衰落的原因,那么昆士兰州体育教育课程的实施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因此,通过解决这些问题,BCE可以继续推进实施进程。课程大纲的成功实施与学生对体育活动兴趣的提高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当教师接受过教育和培训,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教学体验时,学生似乎对体育活动更有兴趣。这有可能提高学生终身参与体育活动的意愿,而这可能与目前存在的肥胖问题有关。因此,政府的最佳做法是支持在所有小学配备合格且充满热情的专业体育教师。

由于儿童学习和提高运动技能的最佳时期是学前班和小学低年级,因此有必要重视专业发展,尤其是 BCE 在 2007 年引入了预备年。

这项研究表明,自1992年参议院对体育教育进行调查以来,BCE (英国大学体育教育)并没有发生足够的改变。然而,由于这项研究的样本规模较小,因此所产生的数据也受到其本身的限制。因此,建议开展一项大规模的研究项目,以确定研究结果的真实性,从而为昆士兰州乃至全国其他教育系统以及卑诗省其他学校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澳大利亚教育
联盟。(2003 年 11 月) 。TAFE资助 :现有有 40,000 名学生错失机会,明年怎么办?第 2 期。

2006年7月7日检索自[http://72.14.235.104/search?q=cache:bimctvgsixoJ:www.aeufederal.org.au/Publications/HandsBrisbaneCatholicEducation.\(1999\).Years1-10healthandphysicaleducationsyllabusimplementationsupportplan.CurriculumUpdate,\(36\),1-6](http://72.14.235.104/search?q=cache:bimctvgsixoJ:www.aeufederal.org.au/Publications/HandsBrisbaneCatholicEducation.(1999).Years1-10healthandphysicaleducationsyllabusimplementationsupportplan.CurriculumUpdate,(36),1-6)

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2005)布里斯班总教区天主教学校 2002-2006 年战略更新框架 (第二版)。

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印刷厂。
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局。(2006a)天主教学校宗教教育。 2006年6月9日检索自https://staffportal.bne.catholic.edu.au/staff/search/results_comms.asp?element=communities&search

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局。(2006b)组织结构图。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印刷厂。
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局。(2006c)校长助理职位。行政管理。布里斯班 :作者。
Codd, J. (1988). 教育政策文件的构建与解构。教育政策杂志, 3(5),235-248。

Colquhoun, D. (1991). 基于健康的体育、健康主义意识形态和受害者有罪论。体育教育评论, 14(1),5-13。

Colquhoun, D. (1992). 技术官僚理性与体育课程的医学化。体育教育评论, 15(1),5-11。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体育教育 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报告。堪培拉：参议院印刷局。

Dann, M. (1999 年 5 月 6 日)。昆士兰州新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研讨会,小学网络日。在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教师在职培训中发表的论文,布里斯班。

Dinan-Thompson, M. (199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昆士兰州健康与体育教育政策的构建与重建。在阿德莱德举行的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Emmel, J. (2004). 国家执行主任的重新任命。 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 51(4),17。
Fullan, M. (2001).教育变革的新意义 (第3版)。 纽约：教师学院出版社。
Glaser, BG 和 Strauss, AL (1967)。扎根理论的发现。 芝加哥：Aldin。
Glover, S. (2001).健康与体育教育中教学话语的社会建构：1992-1994 年国家声明和概况的编写研究。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出版社。

Hickey, C. (1995). 体育教育能算是体育教育吗？ 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 42(3),4-7。
Kirk, D. (1992). 体育教育、话语和意识形态：揭示隐性课程。Quest, 44,35-36。

Howard, J. (2004 年 6 月 29 日)。建设一个健康、充满活力的澳大利亚。
总理约翰·霍华德在塔斯马尼亚州朗塞斯顿的启动仪式上的讲话稿。 2005年1月7日检索自“建设健康：活力澳大利亚”启动仪式网站：www.pm.gov.au/news/speeches/speech961.html。
Kirk, D. (1998). 反对恶化论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指导体育教育的未来。《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45(3),11-15。

Kirk, D. 和 Twigg, K. (1993)。澳大利亚学校体育训练的军事化：初级学员训练计划的兴起和衰落，1911-1931 年。教育史,22(4),319-414。

Macdonald, D.,Glasby, T. 和 Carlson, T. (2000)。昆士兰州风格的健康与体育教育声明和概况。
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47(1),5-8。
Mackenroth, T. (2004年6月11日)。副州长、财政部长兼体育部长的公开信。布里斯班：昆士兰州政府印刷局。

Medland, A. 和 Taggart, A. (1993 年 11 月) 健康相关体能干预的实施：两所小学的案例研究。论文发表于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会议，西澳大利亚州弗里曼特尔。

Merriam, S. (1998). 教育中的定性研究和案例研究应用：教育案例研究修订和扩展版。旧金山：Jossey-Bass。

教育、就业、培训和青年事务部长理事会（MCEETYA）。(1995)。1995 年澳大利亚学校教育国家报告。维多利亚州卡尔顿：课程公司。

Moore, D. (1994 年秋季)。学校体育和体育教育面临的挑战。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41(1/143), 23-28。

Morgan, P. & Bourke, S. (2005). 对职前教师和小学教师对体育教学信心和体育教师教育的看法进行调查。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52(1),7-13。

昆士兰学校课程委员会。(1999)。健康与体育教育初始在职培训材料。布里斯班：昆士兰教育出版服务公司。

施耐德,AG (1982)。政策实施研究。评估 评论,6(6),715-730。
Scraton, S. (1990). 性别与体育教育。吉朗,维多利亚州：迪肯大学出版社。

Swabey, K.,Carlson, T. 和 Kirk, D. (199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体育教育的定义。在阿德莱德举行的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 (AARE) 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Tinning, R. (1990). 意识形态与体育教育：打开潘多拉魔盒。吉朗,维多利亚州：迪肯大学出版社。

Tinning, R. (1994 年 11 月 11-12 日)。体育教育运动：凤凰涅槃、昙花一现还是昙花一现？提交给 ACHPER/SPARC 体育教育与运动：界面会议的论文：西澳大利亚州弗里曼特尔。

Tinning, R. (1999). 体育教育教学法 保琳的故事。 维多利亚州吉朗：迪肯大学出版社。
Tinning, R. (2004). 重新思考体育教师的培养：对知识、身份和思维方式的反思。亚太教师教育杂志, 32(3),241-253。

Tinning, R. 和 Fitzclarence, L. (1992)。后现代青年文化与澳大利亚中学体育教育危机。

Quest,44(3),287-303。
Tinning, R.,Kirk, D. 和 Evans, J. (1993)。健康主义与日常体育教育。载于迪肯大学，《体育教育批判课程视角 读本》(第 77-94 页)。维多利亚州吉朗：迪肯印刷服务公司。

Tinning, R., Kirk, D., Evans, J., & Glover, S. (1994). 学校体育教育：意义危机。变革教育,1(2), 13-15。
Walmsley, HR (1998)。昆士兰小学 1970-1993 年体育教育政策与实践。布里斯班：昆士兰大学出版社。

Webster, PJ (2001). 教师对 K-6 个人发展、健康和体育教育关键学习领域中体育教育的看法。学位论文：伍伦贡大学。
摘要于 2004 年 6 月 28 日从 Informit 数据库检索。
Wellington, J. (2000). 教育研究：当代问题和实践方法。伦敦：Continuum出版社。

作者简介：蒂莫西·林奇

拥有十二年的教学经验,目前是布里斯班天主教教育局下属圣母痛苦小学（Our Lady of Dolours Primary School)的健康与体育教育（HPE)专家和七年级班主任。他已在布里斯班澳大利亚天主教学大学担任兼职讲师四年,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小学和中学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他近期因其对学校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的评估研究而获得博士学位,并因其在健康与体育教育教学和社区推广方面的杰出贡献,荣获2006年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委员会（ACHPER)昆士兰分会颁发的特蕾莎·卡尔森奖。



特价

Rebel Sport很荣幸为 ACHPER 会员提供下次购买任何正价商品 5% 的折扣*。只需在购买时出示您的会员卡并提供优惠码 #29900 即可享受此折扣。